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782-03

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

——“纪念胡秋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 远 笋

胡秋原,是已故著名思想家、武汉大学前辈校友,于1910年农历5月初5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下之胡家大湾,1925年考入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预科,1927年改入中文系。2010年6月16—17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院,共同举办了“纪念胡秋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2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作为知识分子的胡秋原及其知识分子论、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及两大论战、胡秋原的历史与文化思想、哲学观与科学观、民族主义思想等议题,宣读了学术论文,并对胡秋原学术思想的学派归属、思想定位、文艺自由论及对封建社会论的批判、民族主义与文化复兴、超越西化与多元现代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论

郑学稼先生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胡秋原一生以民族大义为重,有知识分子的风骨。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对民族的道义担当,对知识的上下求索,交织出胡秋原的伟大人格。他一生护持“人格、民族、学术”三大尊严。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特别是随侍胡先生多年的尉天骢、刘源俊、姜新立三位亲炙弟子,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胡秋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88年10月,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陶德麟教授曾代表学校接待了回母校访问的胡秋原先生一行,且有诗词唱和。陶德麟称赞胡秋原不仅著作等身,其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而且走出书斋,身体力行,每逢事关中华民族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都能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论述了胡秋原与“三次国共合作”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说,胡秋原以认真好学求是讲理的态度、深厚的学问功力与强烈的民族复兴使命感,超然于政治意型,不囿于学术门派,他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他融贯中西而发表的说论值得世人重视;他传道解惑怀忧不惧、思考大局独立评论、不淫不移不屈不懈的精神,值得全球中华儿女景仰、学习、怀念。台湾政治大学尉天骢教授说,胡秋原自称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正派。台湾佛光大学姜新立教授说,在思想上,胡先生是民族主义思想家,一生追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在学问上,历史学、文化学、哲学、思想理论均成一家之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敏生研究员赞赏胡秋原文如其人,他不仅学识渊博,涉猎文化领域之广、之深,实属罕见,且人品高尚,在中华民族现当代史的关键时刻,他都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而站在时代前列。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胡秋原先生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一生以公共知识分子自任,怀抱道德理想,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又尤重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郭齐勇指出,胡秋原深研传统文化特色,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关系,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郭齐勇认为,胡秋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与传统知识分子仕隐循环的分疏,揭示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

担当,减轻了暴君污吏毒素的作用,不至于让皇权无限伸张,形成了传统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明专制,维系了中国文化慧命的延续。只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历史的治乱兴衰才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也因此,只有在中国才有一部完整的知识分子史。胡秋原对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也有精到的研究,尤对面临深刻的中国文化危机、西方文化危机与政治变局中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有深切的体验。在此基础上,郭齐勇分析了胡秋原论知识分子之应然,及其以切身体验检讨近现代特殊历史背景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两大论战

胡秋原是由文艺问题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他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普列汉诺夫有精深的研究。文艺自由论辩因胡秋原而起,胡秋原又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人物。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创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自称“自由人”,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自由论辩。在其后的社会史论战中,作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胡秋原跳出了西欧历史模式的窠臼,不承认五阶段论直线递进模式的普遍性,提出了著名的“专制社会论”。胡秋原终其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前后长逾70年。姜新立以历史的脉络,将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研究作了历史的纵切,梳理了胡秋原对马克思研究的知识历程;在此基础上,再将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内容作知识的横切,从“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所作的学理上的区分”、“关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等几个面相,系统地论述了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中,姜新立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两个方面,论述了胡秋原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指出胡秋原并没有禁锢于冷战思维模式,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学理分析。

关于文艺自由论战,尉天骢认为政治挂帅和党派至上的运作,造成了对文艺自由的伤害和污染。而政治和党派的现实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于是内外交相迫害和污染,使得中国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遭遇到一波又一波的挫败。广东商学院尹康庄教授认为,对文艺自由与创作自由的区分,是理解胡秋原文艺自由言说的前提,二者并非同一的命题。在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与其他派别的言说,相通之处在于认为文艺创作应是自由的,反对“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但是,由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深入的研究,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论说又均与其他派别不同。尹康庄指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言说,既维护了文艺的一些基本品质、本体属性,又认识到文艺追求某种时代功利目的的合理性。关于社会史论战,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指出,其中除“新生命派”与“新思潮派”两大主要流派外,“自由人”胡秋原提出的专制社会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胡秋原兼通中西学术,较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原论,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反对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线性公式硬套中国史,认为秦至清的社会形态并不能以“封建”名之,胡秋原将其概括为“专制主义”。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葛飞讲师以左翼与“神州”的关系演变为线索,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文化空间的发展变化。

三、民族主义思想

胡秋原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重镇。武汉大学田文军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胡秋原先生秉持的最基本的人生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胡秋原先生在其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始终坚持的理论原则与思想前提。胡秋原在思考中国文化时所秉持的即是一种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胡秋原谓之“纯民族主义”,亦谓之“国民主义”。在胡秋原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我们没有“近代民族国家之基础”,缺乏“民族主义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田文军认为,对于中国文化创新,胡秋原同样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在胡秋原看来,文化建设的“超越”是一种“会通超胜”。这既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创造。李敏生指出,汉字和汉字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富特色的文化特征。李敏生从“汉字是中华民族团结之王然纽

带”、“尊重大陆的简化汉字”两个方面论述了胡秋原的汉字学说。李敏生指出,胡秋原的汉字学说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和科学上的远见卓识,胡秋原汉字学说的落脚点还是民族主义的。

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教授认为,胡秋原的民族主义内涵十分丰富,如政治上的国家至上论、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说、学术上的理论历史学等。何卓恩指出,胡秋原的理论历史学的唯智倾向,超越前进说的含糊性,以及国家至上论对自由民主的遮蔽,使其民族主义亦显示出若干非理性的偏向。武汉大学博士生谢远笋指出,在胡秋原的思想体系中,“民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囿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分析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主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他通过对中国的道统一天下、政统一国家的深入探讨,分辨出了古今中西民族观念的异同。胡秋原承继梁任公的“新史学”,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来彻底唤醒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文化守成主义者诉诸中国文化,自由主义者诉诸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者诉诸无产阶级。

四、哲学与科学、文化与历史

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胡秋原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对古今中西文化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关注,都有哲学思想贯穿于其间,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心学特征。正是从心学路向出发,胡秋原形成了自己理解文化与人生的哲学思想。在李维武看来,胡秋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不属于现代新儒家人物,但他却对儒学的现代价值持积极认肯的态度。胡秋原对儒学核心价值的吸取与弘扬,从一个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儒学核心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刘源俊在论文中集中论述了胡秋原的科学观,指出胡秋原少年时期以“科学救国”为志向,考进武昌大学时就读的是理预科,两年之后才转入文科,他一生关心科学史与科学方法论。刘源俊从科学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态度、科学史与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及科学发展政策等四个方面,详尽地分析了胡秋原的科学观。

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侧重分析了胡秋原的西方文化观。胡治洪指出,通过广泛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胡秋原认为,西方文化在近四百年发展繁荣的后期,已经陷入深刻危机,并进而危及整个人类;导致西方文化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畸变为势利主义、虚无主义,而近代西方启蒙价值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或根本未能落实,或发生扭曲,故对于这种文化必须予以扬弃的超越。胡秋原揭露西方文化危机的主要目的在于矫正本国西化人物崇西贬中甚至趋西弃中的心态,由此表达的“超越西化”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胡治洪认为,时至今日,在西方文化的说服力逐渐减弱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日益高扬的形势下,仍有西化人物放言西方文化一贯优秀并且永远优秀,且将理论形态的近代西方启蒙价值认作西方社会的现实;相应地丑诋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只是错误和失败,除非融入西方文化,将没有未来,并在所谓“新批判”的旗下对世人公认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价值加以肆意歪曲和糟蹋。他们的片面言论,对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具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状况,对胡先生“超越前进论”中所包含的“超越西化”思想予以特别表彰,无疑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介江岭侧重分析了胡秋原的中国文化观。武汉大学硕士生介江岭指出,胡秋原对中国近现代所面临的文化危机有着独到的认识,在与其它各家文化理论的辩难中,他以自由和民族为基本精神原则,提出了超越前进的文化论主张。清华大学博士生尹捷通过将胡秋原 30 年代关于五四的思考,放回到他所处的上海复杂的文化场域中进行考察,分析了胡秋原与五四纠结一生的精神联系的初始建立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所处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位置”。